

北京新农村建设研究基地
北京农学院都市农业文化科研创新团队
北京生态文化协会 资助
北京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业与农村文化委员会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阈下 生态文化创新发展研究

Jing Jin Ji Xietong Fazhan Shiyuxia
Shengtai Wenhua Chuangxin Fazhan Yanjiu

郑文堂 马宁 华玉武 等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北京新农村建设研究基地
北京农学院都市农业文化科研创新团队
北京生态文化协会
北京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业与农村文化委员会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阈下 生态文化创新发展研究

郑文堂 马 宁 华玉武 等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阈下生态文化创新发展研究 / 郑文堂等著.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109-22058-4

I. ①京… II. ①郑… III. ①农业产业—产业发展—研究—华北地区 IV. ①F3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8051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姚 红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20mm×96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345 千字

定价: 45.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著者

郑文堂 马 宁 华玉武 范小强
王永芳 王红英 王建利 孙亚利
高建伟 陈 勇 李国敏 李振兴
张旭辉

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的理性思考

(代序)

郑文堂

生态文化作为文化的形态之一，具有文化的基本属性，它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为依托，传承了人类精神文化的结晶，创造了人类思维的新领域。同时，生态文化在人类的物质实践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对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深远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生态文化研究必须要打破行政地域界限，将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自然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开展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有益的尝试、理性的选择，研究的时代性、系统性和实践性尤为突出。

一、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的时代性

(一) 开展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是破解京津冀生态难题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三地人口相加超过 1.1 亿，约占全国总人口十分之一，而三地国土面积相加仅有 20 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2%。人口与资源紧张的矛盾尤为突出，京津冀面临的环境压力已经达到极限。这充分证实了恩格斯的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但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在传统发展模式下，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生产要素的投入，对资源的需求和浪费都很大，逐渐超出了京津冀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和修复能力，进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破解京津冀生态危机的关键在发展生态文化，在全社会牢固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用生态文化引领产业发展，逐步淘

汰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落后产能，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京津冀面临的生态危机。

（二）开展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可以为区域生态文化协同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京津冀三地在行政区划上虽然分属不同建制，但在地理上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单元。以往三地生态文化建设的经验表明，各说各话、各走各道的生态文化建设之所以很难取得实效，关键在于三地没有打破行政地域壁垒，各行其是，未能发挥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整体效应。开展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不是从一地一事出发，而是从三地整体出发考虑问题，重点破解制约三地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的思想障碍、制度障碍、组织障碍和资源障碍，实现三地生态文化建设的无缝对接，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为京津冀三地生态文化协同发展建言献策。

（三）开展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生态文化协同创新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构想的基本内容之一，而且在协同发展战略中居于优先地位。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历程表明，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往往得不偿失，治理环境所耗费的投入远远大于因损害环境而获取的经济收益。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生态先行的原则，边发展边保护，以健康的经济发展带动生态保护，以严格的生态保护巩固经济发展的成果。开展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就是落实生态优先原则的具体表现。通过开展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并促使研究成果向实践转化，必将使京津冀三地在生态文化建设的相互协作中找到交集，进而推动其他领域的协同发展。

二、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的系统性

（一）研究生态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外延

开展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首先，要从理论上弄清楚生态文化的具体内涵，什么叫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是否同一概念，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之间究竟有何区别，这些问题不仅对普通读者来说是一个困扰，而且同样困扰着研究人员。因此，开展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不能绕过这

些问题，必须要从理论上给予有说服力的解答。其次，研究生态文化，必须要从历史的角度对生态文化进行系统梳理。人类不是孤立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整个自然界是由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两部分构成的，正是人的实践活动促成自在自然不断向人化自然转变。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开始就重视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最初表现为维系生存需要的领地意识。人类是如何从领地意识一步步地上升到环保意识，这需要研究者进行必要的梳理。因此，按照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生态社会这一序列研究不同社会生态文化，对于弄清楚生态文化的发展源流至关重要。当然，认识世界的根本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要想使改造世界在理性思维支配下进行，就必须要了解研究对象自身的价值。只有深入研究生态文化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关联，才能从根本上明确生态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

开展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只有从中外生态文化理论中吸取有益的养分，才能做到推陈出新，有的放矢。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思想极其丰富，尤以儒释道三家最为重要。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万物有灵，对今天的生态文化建设都有重要启迪，因此有必要加以研究。西方社会也比较重视生态文化建设，西方生态文化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人类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三个阶段，分别研究这三个阶段生态文化思想的发展演变，对我们加强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当然，无论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思想，还是西方生态文化理论，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阶级色彩，我们不能全部照搬，必须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吸收。真正对京津冀生态文化建设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涵盖了生态认识论、生态统一论、生态关系论、生态危机论和生态理想论等五个方面，都需要加以系统研究和整理，才能挖掘出符合当代需要的思想精华。

（三）研究国内外生态文化区域建设的主要经验

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只有充分借鉴国内外生态文化区域建设的成功经验，才能避免走弯路，实现弯道超越。鉴于京津冀的地域和文化特点，借鉴国内生态文化区域建设重点应从以下三个角度选材：一是沿海生态文化建设。京津冀地域属于沿海地带，与之特点相近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生态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于京津冀来说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二是山区生态文化建设。京津冀三地西倚太行，北靠燕山，区域内山地面积广大，与之地域相近的太行山、泰

山、秦岭等山区生态文化建设对于京津冀来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三是古都生态文化建设。北京有着八百多年建都历史，与之地位相近的西安、洛阳、南京在生态文化建设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可供参考。除了借鉴国内生态文化区域建设的经验外，京津冀三地还要借鉴国外生态文化区域建设的经验，做到洋为中用。国外生态文化建设比较成功的案例当属北美、欧洲和日韩等地，对于国外经验必须要辩证分析，重点借鉴那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经验和做法，而不能完全照搬。

（四）研究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的具体路径

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涉及到京津冀三地，为了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可行性，有必要从宏观上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构想，从微观上了解三地生态文化协同发展的现状。只有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构想出发开展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才能避免与国家的大政方针背道而驰，才能增强研究的方向感和时代感。只有深入调查了解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发展的现状，才能从中发现问题，找到制约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的各种不利因素，然后对症下药，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这些措施从大的方面看包括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模式创新等四个方面，每一方面都需要系统深入的研究，才能取得创新性的成果。此外，鉴于人才和科技在生态文化协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还有必要深入研究高校在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探索高校参与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的有效路径，为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提供人才保障和科技支撑。

三、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的实践性

（一）发挥政府在生态文化协同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政府作为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的第一责任人，要充分发挥自身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生态文化宣传教育，引导生态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的区域性协调机构。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打破地域壁垒，发挥整体效应，这就需要在中央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区域性协调机构，加强对京津冀三地生态文化建设的统筹规划。其次，完善各级财政分配机制，加大对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的资金投入。生态文化建设和环境保护支出，属于跨区域、外溢性较大的重要支出，合理划分各级财政的承担费用尤为必要。当前在区域发展的基础上，应积极推动财政体制改革，尝试各级共担

事权和定量划分，逐渐建立明确的各级财政分担机制。再次，加强生态文化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普及生态文化。与生态文化建设的要求相比，全社会生态意识和生态修养仍有很大差距和不足，这成为影响和制约生态文化建设的一大短板和薄弱环节。只有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才能使全社会对生态文化建设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一个新高度、新境界，既内化于心、又外化于行，转化为支持和参与生态文化建设的强大共识和切实行动，既为生态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又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二）发挥企业在生态文化协同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企业进行创新的前提是必须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创新的结果是要提高竞争力、获得经济效益。国家的优惠政策以及生态建设中潜在和长远的效益，使一些有远见和胆识的企业家以各种形式直接参与到生态建设中来，成为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的主力军。企业参与生态文化协同创新关键是做到两点：一是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夯实生态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发展生态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与生态文明的最佳结合。企业要立足当前京津冀生态经济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产业优势和特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型农业，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和实用技术，推进农业标准化和食品安全生产；大力发展森林旅游、滨海旅游、民族风情文化体验游、红色旅游、边关文化和历史文化旅游、康养养生和农业休息旅游等具有京津冀特色、竞争力强的生态旅游产业。二是积极投身生态文化公益事业。近年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逐步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回馈社会，投身于环保公益事业。企业参与公益事业不仅是责任所在，更是发展所需。企业履行生态责任不但不会拖累企业，而且会使企业经营得更好。因为通过投身生态文化公益事业，企业对日益突出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有利于树立自身负责任的企业形象，确立在消费者心目中地位，这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三）发挥高校在生态文化协同创新中的智库作用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科学研究的重地和文化遗产与创新的重要载体，理应在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中发挥应有作用。具体来说，高校参与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整合教育资源，探索独立

设置生态文化专业学科。整合生态文化教育资源，就是要按照教育资源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组合成一个资源健全、配置合理、共享互补、充分利用的集合型有机体，使之在生态文化教育中发挥整体功能优势。探索独立设置生态文化专业学科，可以为生态文化教育的深入发展提供完善的学科体系。二是设立生态文化研究课题，鼓励师生开展生态文化研究。在高校中设立生态文化研究课题，不仅有助于高校师资团队的建设，让师生在课题研究当中，接触自然环境，了解生态文化知识，培养师生对大自然的真切热爱之情，而且可以通过推动研究成果向实践转化，为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提供参考借鉴。三是组织专业师资编辑出版生态文化普及性读物。目前，关于生态文化的学术性著作已经有了一些，但这对于缺乏专业功底的普通读者来说阅读起来难度较大，很难吸引大家的阅读兴趣。有关生态文化的通俗性读物在市面上较为少见，因而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和专业优势，组织大家写小书，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归类、梳理以及比较分析，将抽象系统的生态文化知识深入浅出地介绍给普通读者，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宣传普及生态文化的效果。

（郑文堂：北方工业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生态文化协会副会长，原北京农学院党委书记，北京新农村建设研究基地主任）

目 录

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创新研究的理性思考（代序）	郑文堂
------------------------------	-----

第一章 生态文化	1
-----------------------	----------

第一节 生态文化释义	2
第二节 生态文化演变	9
第三节 生态文化类型	14
第四节 生态文化特征	17
第五节 生态文化功能	20

第二章 生态文化理论基础	27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思想	27
第二节 西方生态文化思想	34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思想	40

第三章 国内生态文化区域建设	49
-----------------------------	-----------

第一节 沿海生态文化建设	49
第二节 山区生态文化建设	60
第三节 古都生态文化建设	67

第四章 国外生态文化区域建设	75
-----------------------------	-----------

第一节 北美模式	75
第二节 欧洲模式	83
第三节 东亚模式	91

第五章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构想	103
------------------------------	------------

第一节 提出过程	103
第二节 战略选择	104
第三节 内涵及实践意义	119

第六章 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发展要求	122
第一节 基本内涵	122
第二节 主要原则	126
第三节 战略目标	132
第七章 京津冀生态文化建设评析	141
第一节 成就和基本经验	141
第二节 问题	152
第三节 归因	157
第八章 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发展理念创新	163
第一节 以人为本理念	163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理念	171
第三节 依法治国理念	179
第九章 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发展制度创新	188
第一节 政策创新	188
第二节 法律法规创新	195
第三节 长效机制创新	212
第四节 生态文化的制度构建	220
第十章 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发展组织创新	225
第一节 政府管理创新	225
第二节 企业参与创新	230
第三节 发展非政府组织	236
第四节 社会团体创新	244
第十一章 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发展模式创新	253
第一节 生态农业模式	253
第二节 生态公园模式	262
第三节 生态保护区模式	267
第十二章 高校助推京津冀生态文化协同发展	272
第一节 高校在生态文化协同发展中定位	272

第二节 高校生态文化教育现状	278
第三节 高校参与生态文化协同发展建议	284
参考文献	293
后记	296

第一章 生态文化

人类及人类社会的演化、成长和延续都历经了漫长而持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界和自然资源是人类及其社会生存、发展和传承的外在条件和物质基础，而文化作为人类思想实践的果实，是人类在认识“自我与他者”和改造“自我与他者”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产物，即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通过认识“人与自然”、改造“自我与自然”所创作的一切成果（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形态之一，具有文化的基本属性，它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为依托，传承了人类精神文化的结晶，创造了人类思维的新领域。同时，生态文化在人类的物质实践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对人类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深远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人口急剧增长，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而与此同时，其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广泛使用，促进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提高了人类社会认识自然及其规律能力，加速了人类及其社会开发自然资源和改造自然的实践；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人口和需求的不断扩大加速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获取，也逐渐超出了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和修复能力，进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出现证实了恩格斯的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①但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②。生态危机是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过度破坏造成的结果，生态危机不仅是工业文化的危机，其实质也是人类文明的危机，更是人类文化的危机。

生态文化正是在反思、批判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过度掠夺自然资源的生态危机的基础上，继承了原始社会生态文化、农业社会生态文化和工业社会生态文化的精华，摒弃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融合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思维理念，并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稳定性为核心，是具有历史传承、赋有时代精神的思想结晶。生态文化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

②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类社会在不同时期对待大自然和自身文化传统的态度,也凝结着人类在内心深处的生态意识和人本关怀。新时期新阶段,科学技术迅速融入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生态文化也在不断继承丰富历史资源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些都对人类社会如何发展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

第一节 生态文化释义

所谓“生态文化”(ecological culture),是由“生态”和“文化”两个基本概念所组合而成的复合词。要准确理解生态文化的意义和内涵,首先需要厘清“生态”“文化”与“文明”的概念,界定生态文化的内涵外延,并且要辨析“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以及“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

一、生态、文化与文明

“生态”源于古希腊字“Eco”,原意指生存的状况或者生活的环境,具有居住状况和生活状况等含义。现代汉语则特指某种生物自我生存、生活和成长的特定的状态(尤其多指自然的、原初的环境状态),或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最早定义了“生态学”的基本内涵,用来指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现如今,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普遍,“生态”的概念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广义的“生态”概念是指一切有生命实体的生存与发展的状况,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如山川河流、森林湖泊、经济政治和社会人文等。狭义而言,“生态”是特指一切生物生存和发展自然环境,包括大气、水文、气候、土壤,以及其他动植物资源等。简而言之,“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

“文化”的词源为拉丁语“cultura”或者“colere”,原意为居住、栽种、保护、朝拜等,后引申为聚居、陶冶、礼拜等意思。^①汉语中将“文化”分而论之,“文”古义指痕迹、轨迹、纹路和纹理,《说文解字》将其表述为:“文,错画也,象交叉”;“化”大都指变易、改易、造化与教化,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礼记·中庸》)。178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最早提出“文化”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

^①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46页。

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①。文化也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②因此,文化指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的一切成果,既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也包括无形的精神产物。文化也具有多层结构的特征,有两分说(物质和精神)、三分说(物质、制度和精神或者行为、信息和成就)等。“文化”的意指表明,文化涉及自然、社会、思维等多个方面,文化是人类及其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的结果。

“文明”最早源自《易经》,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周易·乾·文言》),古义有光明、文采、文教、合乎人道等意。“文明”(civilization)出自于古拉丁文“Civis”,最早指“使……进入一种社会组织”,后引申为“教化、开明、文明化”等意思。^③文明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如“两分法”(物质和精神)和“三分法”(物质、政治和精神)等。按照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文明”的层次结构又可分为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总之,“文明”是人类社会不同时期,在具有相关性的区域内,所形成特定的相同价值认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也是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客观性与自我的主观性,以及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劳动成果。

追本溯源,中西文化中“生态”“文化”与“文明”的词义各有不同,但都与人类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物质生产活动息息相关。“文化”与“文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词源含义不同、产生时间不同、蕴含内容不同和传播途径方式不同,两者的联系在于创造的主体都是人、都是生产实践的产物,前者是后者内在价值,而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④“生态”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和持续发展,“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核心和灵魂,“文明”则是“文化”的载体、体现和象征。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统一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也融进人类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相关作用的过程。

二、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的概念最早出自于国际社会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佩切伊,其认为“人类过度的掠夺,破坏了生物圈的平衡,进而破坏了人类

① 周鸿,《人类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409页。

③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46页。

④ 杨海蛟、王琦,《论文明与文化》,《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1期。

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人类自救,必须进行文化性质的革命”^①。这种文化性质的革命必然形成一种新的形式的文化,即“生态文化”。关于“生态文化”的概念,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类是“新生论”,即认为“生态文化”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代表性学者如著名的生态学家、哲学家余谋昌,他认为:“生态文化是继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之后新的文化形态。”^②同时,他也认为“生态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以自然价值论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广义是指以自然价值论为指导的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③按照这种思路,“生态文化”主要具有三个层次结构:生态文化的物质层面、生态文化的制度层面和生态文化的精神层面。孙江、韩也良和王如松也认为“生态合理的文化简称生态文化,它是生态市建设的灵魂,涉及人的意识、观念、信仰、行为、组织、体制、法规以及其他各种有形式的文化形态。”^④这种“新生论”描述的特点在于,它将生态文化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并且按照整体论和系统论的方法按照层级结构进行分门别类。

第二类是“范畴论”,即认为生态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文化的系统组成要素,也是必不可少的成分。代表人物有我国的生态文化协会会长江泽慧,其认为:“广义生态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生态文化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共荣的生态意识、价值取向和社会适应。它包括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美学、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文化载体和生态制度。”^⑤任永堂则认为,“生态文化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和信念的文化,是一种基于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为主体构成的文化体系。”^⑥另外,有学者认为:“所谓生态文化,实质上就是一个民族在适应、利用和改造环境及其被环境所改造的过程中,在文化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形成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蕴含和表现在这个民族的宇宙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等之中”。^⑦综上可知,范

① 赵宗彪,《论生态文化在建设》,《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

② 余谋昌,《生态文明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③ 余谋昌,《生态文化是一种新文化》,《文化》,2005年第1期,第99页。

④ 孙江等,《扬州生态文化建设的战略构想》,《科技与经济》,2003年第4期。

⑤ 江泽慧,《弘扬生态文化 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人民日报》,2013年1月11日。

⑥ 任永堂,《生态文化:现代文化的最佳模式》,《求是学刊》,1995年第2期。

⑦ 郭家骥,《生态文化论》,《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